

=====

文革博物馆通讯（九九一）·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五九期（zk1901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劫后反思】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	张运钧·李 颖
【我看文革】	文革五十二年再思考	李伟东
【往事非烟】	《云卷云舒——清华笔记》（选载之二）	傅培程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劫后反思】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
——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

• 张运钧·李 颖 •

◇ 前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至今已五十多年了，半个多世纪啊！当年朝气蓬勃的年青人，都已是“古稀”老人了！“讲真话”是古稀人应有的品格，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把真实的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奉献给世人。尽管年代太久远，尽管现存的、当年的、文字档案记载资料少而又少（仅有《东方红报》、《首都红卫兵报》、《动态报》、《大字报汇编》等），但是我们这些当年文革运动的亲历者，还是尽全力来回忆和记述当年的文革运动。尽管每个人的回忆会有错位、遗漏，我们选用多人的回忆录，找更多人来回忆证实，尽量“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来展现当年红遍中国的“地院东方红”的兴起、发展、灭亡的兴衰沉浮和曲折过程。看看我们这些年青人如何从天真单纯无限忠于毛主席和党中央，疯狂地信奉个人迷信，成为最为狂热的崇拜者，再到派性膨胀、再到……我们既是错误路线的追随者、执行者，我们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同样我们中的有些人也曾错误路线的执行中加害于他人，以至于为此受到了惩罚，付出了青春大好年华的代价。我们想：人们应该记住这段历史。

五十多年后再看这段历史，我们更多的是思考、再思考，反思、再反思。

文化大革命运动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当年参加了文革运动又错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这些就是我们这代人晚秋的沉思！

通过对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梳理，为我们反思、研究和再认识文化大革命运动，特别是为地院东方红的兴衰与沉浮，提供了一个认识的平台。为我们理出一条清晰的典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脉络，从脉络中很可能看到目前为止中国政治生态特色的缩影。

（一）地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是文革运动的一个缩影

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的全过程，特别是地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史，不仅是全国高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全过程的一个缩影，也是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全过程的一个缩影。它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个性特色，这是其他许多单位所不具备的。这些特色就是：地院东方红成为了毛主席、中央文革直接指挥的“战斗队”，同时成为了党内高层各种政治势力争夺利用的对象。

清华大学的杨继绳先生在其《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文中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一段论述，对文革运动进行了极为深刻准确的总结和评价，他代表了 we 当年参加文革运动的这一代人，在经过对文革的认真反思之后，对文革的再认识。

“文革像一个长期革命过程的浓缩，像巨大革命画卷的缩微。开始批判一切、否定一切。鼓动反潮流，破坏旧秩序。旧的秩序破坏以后，群雄蜂起，你争我斗。今天这一派得势，明天那一派掌权；今天整人者，明日被人整；今日的战友，明天的仇敌。当全民被政治斗争拖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就出现了派别的联合，由动乱向稳定转变，社会思潮和人的行为由激进趋于保守。价值观念和革命的初始相反；今非而昨是，昨是而今非。最后由混乱走向秩序。”

“文革像钱塘激潮一波又一波地涌动。每一波都是多种力量互动的结果。每一波都有一批人被政治恶浪吞没。”

“文化大革命中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野蛮、黑暗、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在权力斗争的深层还有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之争，权力是实现政治道路的工具。”

“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实现‘天下大乱’，就需要造反派。毛也不能让无政府状态长期存在，要恢复秩序实现‘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

“文革初期毛挥动他的左手，鼓励造反派冲击官僚，让造反派将官僚们‘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文革后期毛泽东挥动他的右手，让官僚遏制造反派，但要求官僚们‘不要整他们’。在官民矛盾尖锐的条件下，哪能‘烧而不焦’？哪能不整造反派？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

正因为如此，我们当年响应毛泽东号召参加文革的一代人，以及全体中国人民，为文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地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具有“通天”的特色

自从一个神秘人物——肖力，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走进北京地质学院、走进北地东方红之后，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从此就具有了“通天”的特色。在当时的情况下，地院的广大师生，特别是地院东方红的广大师生得知此消息都是欣喜若狂，以此为荣，感到骄傲和自豪！继此之后，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关锋、阎长贵、王广宇，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等人也先后走进了地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当然，在他们后面的领导人——周恩来、陈伯达、江青也 不同场合接见过地院东方红代表，发表讲话，表示对地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地院东方红（也有

斗批改兵团)的关怀和支持!这样,地院东方红成了毛泽东、中央文革直接指挥的“战斗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当时,我们是不明白的。

五十多年后,当我们再看文革,从聂元梓、蒯大富、万润南等人写的文革回忆录中,我们看到了这些都是毛泽东精心策划与布置的。清华大学的文革是刘少奇、薄一波、王光美蹲点的单位。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曾一时禁止中央文革小组介入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详见参考文献21和25),改派周恩来负责处理清华大学文革运动中发生的各类事项。而北京大学的文革,则是派的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去介入的。很显然,肖力等人走进地院,是受毛泽东、江青的指派。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这样策划与布置,在清华大学编辑的文革回忆录中,虽然已有多人对此提出了分析和解释,但是至今仍耐人寻味!

北京地院东方红也正是由于“通天”,得以迅速壮大、发展,助推了原来不出名的“何家兵”(何长工之语)——迅速地红遍北京市、红遍全中国。北京地院的文革运动当时走在了北京各高校的前列,成了北京高校的典型代表和榜样之一,许多院校的战斗队,都集聚在地院东方红的大旗下。地院东方红也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做出了“积极贡献”!

而后,另一个神秘人物——叶向真,也走进了地院东方红,这是东方红的另一条“通天”之路。

这两个神秘人物先后走进北京地院、走进地院东方红,既给地院东方红“增光添辉”,同时也飞来了“横祸”,更增加了耐人寻味和不解之谜!显然,地院东方红在文革中成为了党内高层不同政治势力争夺与利用的对象!

地院的广大师生绝大多数出身于平民与底层,农村出身的学生尤多,高干子弟极少,于是地院的学生具有朴实、单纯、忠厚的特质,这与北大、清华学生的成分结构形成了明显的不同。这可能就是成为神秘人物选定地院的基本原因之一;也是因为这样,地院的文革与北大、清华的文革有很多不一样之处。相对而言,地院文革运动简单,较为平和,二派斗争并不激烈,也没有出现大型武斗。尤其在肖力身份公开,表示支持东方红后,几乎一边倒,地院东方红占据了绝对多数及领导地位。

今天回头看这个问题,神秘人物之所以选择地院,实质是党内高层政治势力尖锐权力斗争的需要。从肖力、叶向真、周荣鑫介入地院文革运动,目的就是争夺和利用学生的政治热情,为其政治目标服务。

以神秘人物方式出现在文革运动中,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历史局限性,说明共产党尚未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的转化。这也是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具体体现。

(三) 地院“东方红”在文革中“创造”多项第一

1, 1966年6月20日,地院发生了著名的“6·20事件”。广大师生自发组织近千人的游行队伍,到工作队驻地,向工作队反映群众对地院文革运动的意见和希望。这是首都高校第一个自发组织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没有发生任何不文明的争斗事件,以和平方式开始,以和平方式结束,获得了成功。

2, 1966年8月17日,北京地质学院全院性的组织——“东方红公社”宣告成立,这在首都高校中,北京地质学院第一个实现了全院性的造反派组织的大联合。

3，从1966年8月23日至1966年10月27日止，为期两个多月，地院东方红组织了上千名师生先后四次进驻地质部机关上访、请愿，要求地质部党委让地院工作队回校承认错误，交出整人的黑材料，给师生平反、道歉。地院东方红的行动获得最后胜利。这四进地质部的行动，开创了造反派第一个进驻国家部委机关的先例，推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影响极其广泛。

4，1966年9月19日，地院东方红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东方红”的口号和目标行动计划，下决心一定要争取地院文革运动的领导权，来改变造反派组织当时处于受压制的状态。在北京高校中第一个公开提出夺权口号。

5，1967年1月25日，《首都红卫兵》报发表社论：《打倒“私”字，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再论一切权力归左派万岁》（详见参考文献11）。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经他批准，题目改为：《打倒“私”字，实现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并在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发表。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地院东方红的孟繁华同学。这清楚地表明：地院东方红的广大师生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在高校中，第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造反派队伍中存在许多问题，所以率先提出：必须打倒“私”字，实现大联合，才是唯一的出路，从而也获得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6，1967年4月3日，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这是全国高校第一个成立革委会的。实际上，是地院东方红掌握了北京地质学院的一切领导大权。

7，地院革委会成立后，一切校园秩序与管理恢复正常，于是也是高校中第一个接待外国来宾的。先后接待的有：越南副总理黄文欢、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日本和非洲国家的民间团体等。（详见参考文献2）

8，1966年12月14日下午阎长贵受戚本禹委托，向地院东方红头头朱成昭下达去成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的指示。这也是地院东方红第一次接受中央文革直接下达的任务。地院东方红在执行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先是在成都的北京地院东方红具体负责人给朱成昭电话，阐述了不同意揪彭回京理由；朱认为执行不得力，为此发火，而在成都的地院东方红派代表飞回北京，向朱成昭说明观点与理由，强烈要求向中央文革汇报情况。这在当时完全是大胆的、出格的行为，因而受到戚本禹的严厉批评。转而，戚本禹表示，你们地院东方红不干，我就找北航去干。无奈之下，朱成昭派总部人员赴成都监督执行揪彭行动。五十多年后，重新认识这件事，证明：当时地院东方红是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是正确的。

9，1967年3月5日，由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谢富治和周景芳等人向地院东方红代表宣布，地院东方红的朱成昭“闭门思过”，不再担任头头，宣布了由王大宾、李贵、杨雨忠、孟繁华等人组成新的领导班子。还明确表态：“地院东方红这面旗帜不能倒！”这在全国高校中是第一个，也是唯一受中央文革小组直接命令改组领导班子的造反派组织。

10，1967年1月开始，地院东方红头头朱成昭在各种不同场合，提出他对当前文革的思考与看法，后来总结为“八大观点”，为此，他最终坐了八年监狱。朱成昭是当时第一个敢于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及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提出怀疑与反对的造反派头头。今日重新认识，应该承认，朱成昭当时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精神、不完全盲从、不完全狂热崇拜的年轻人。当然，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他的思考与精神最终还是做了政治的牺牲品。

11, 1967年底,地院成立党的核心小组,将当时还不是党员的革委会主任王大宾和副主任聂树人也选进了核心小组,这在全国当时的“群众性整党”中是首创性的“新生事物”。1968年7、8月,聂树人、王大宾相继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开了吸收造反派负责人入党的先例。但后来此事未得到军宣队的承认。

(四) 文革充满了无法无天的“政治恶斗”和“群众专政”

地质学院的文化大革命,也和全国一样,不停地有人整人,不停地有人挨整、被打倒。从文革运动开始,是工作队整了给他们提意见的师生,把他们定成“反革命”、“右派”;学生开始造反,然后是反过来批判与批斗工作队长邹家尤,地质部何长工等当权派;再后来,地院革委会把高元贵、安静中等人打成“高安反革命集团”;最后到朱成昭、蒋良朴、杨雨忠、王大宾、聂树人、田春林、伏庆是等学生因为各种原因挨整,甚至坐牢,无一幸免……再看全国的文革运动更是如此,从中国最高层刘少奇、邓小平开始到各级当权派无一幸免的挨斗、挨整、入狱,包括林彪、江青“四人帮”都是如此命运。

如此看来,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一场无法无天的“政治恶斗”和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这一切都是为了权力而争斗。这可能就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态的中国特色的浓缩,也是中国政治生态中民主与法治的大倒退的典型范例。

正如王大宾在其文革回忆录中说:“文革运动中,毛泽东始终在幕后。此次他亲自安排制止清华大学的武斗行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借此进一步让高校的学生退出政治舞台。事先不打招呼,工人与学生会发生冲突,可能会流血,都是毛泽东事前想好想到的。……随后而来的是造反派被清洗、被镇压,更有一场所谓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将我们五个头头一网打尽。”(详见参考文献5)

王大宾的回忆录第165—167页还写道:“实践证明我们没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文革运动的实践证明我们不行。所以到1976年,毛主席说老中青三结合,青年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

聂树人在其文革回忆录中说:“我也在‘反思’。我反复回顾文革中我有什么错,值得反思?想来想去,在文革中,我好像没什么大错,我该反思什么?文革一开始,我因对学校党委、工作队提了点极为善意的意见,就被打成‘右派’,打成‘反革命’。”

“为了这个不公,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我奋起与专制者进行了斗争,要求他们为我们平反。经过长期较量,我们才夺了权,建立了革委会。”

“我唯一的错误,就是不敢对毛泽东的专制公开提出批评,还违心地执行之。如不执行,我就有可能成为朱成昭第二。”(详见参考文献18)

田春林在其文革回忆录中说:“以我一个文革中红卫兵的亲身经历,我体会到,红卫兵运动可以说‘成也毛泽东,败也毛泽东’。运动的初期,毛泽东为了打倒自己的政治对手刘少奇,支持红卫兵运动,甚至不惜派出自己的老婆和女儿煽风点火。而当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政治目的已经达到,红卫兵造反派已没有利用价值了,于是又发动所谓抓‘五一六’运动,制造莫须有的罪名,把这些人统统打下去。联想1949年建国前他为了打倒政治对手蒋介石,曾那么卖力地和民主党派套近乎,许诺共产党胜利后要和各民主党派组成联合政府,在那个著名的和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向民主党派和人民描绘了多么美好的政治远

景！当自己大权到手，为扫清障碍，实现独裁统治，1957年发动了所谓‘反右派’斗争，把所有民主党派一巴掌打下去。这几乎和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历史结局有异曲同工之妙。”（详见参考文献6）

再来看地院一位普通教师宋翔雁老师在他的文革回忆录中的叙述：“在文革结束近50年的今天，冷静深思，不得不令人痛心地点头承认：地院东方红所代表的造反派群体，在这场革命中的作为，就其性质而言，也和江青在自己的抗辩词中坦诚道出的：‘我就是毛主席身边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一样，只不过充当了伟大领袖权力斗争中的鹰犬角色，最终也难逃‘狡兔死，走狗烹’的可悲命运。”

“现在要心悦诚服地承认这一点，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难堪的、痛苦的，因为，这样做岂不完全否定了我们当初满怀激情投入文革的初衷？但只有勇敢地承认这一点，我们方能从这场浩劫中完全并真正地解脱出来，从而彻底地清算我们头脑中残存的文革因子，确保不会再次盲目跟进今后可能再次出现的文革式运动，真正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详见参考文献3）

地院学生古宝琳（王大宾的前妻）在经过痛苦的反思之后，是这样认识的：“这一批被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巨浪推向舞台的时代骄子，政治光环只在他们头上晃了几个月，就被他们的伟大舵手投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尽心尽力地效忠这个政权，也不是他们没有能力去肩负历史重任，而是他们的领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他们，也不准备去依靠他们，只是在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历史阶段，暂时需要他们的热情去助燃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企望达到他发动这次大运动的目的，企望把中华大地引向他苦心设计的乌托邦蓝图。但他失败了。哪怕是一度鼓吹得像神一样的太阳也无法跳出自己一手设计的政治和社会怪圈。他的大胆尝试带给养育他的祖国无穷的灾难和痛苦。”（详见参考文献22）

以上是当年北京地院文革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50年后对文革的反思。接着，看当年的风云人物清华大学蒯大富50年后对文革的反思：“像我们这样的，应该说是他们比较信任的，最后在其他势力的压迫下，他也不得不抛弃我们。我从1968年开始就这么理解，我们下台虽然是牺牲品，但是在右派压力下，毛泽东没有办法，包括王力、戚本禹都是一样，毛泽东其实很欣赏他们，但是为了平息右派的愤怒，就把他们拿下了。”（详见参考文献23）

我们最后还看参与文革的一般群众，清华当年的研究生黄瑞和对文革的看法：“纵观整个文革史，就像是一场大型木偶剧。木偶们在台上表演，都带着假面具，慷慨激昂地讲着那些千篇一律的话。我们就是当年台下的那些观众，瞪大了眼睛，也看不到面具后面的真面目。木偶们走马灯似地被换上，又被撤下，由一只巨大的手操控着，这只手的主人就是我们顶礼膜拜的‘伟大领袖’。木偶剧中的每一段剧情，每个角色的最后结局，都要取决于‘伟大领袖’的一句话、一个指示。即便在他行将辞世的濒危阶段，即使连言语都难以表述完整的时候，他说的一字一语仍然是圣旨，是一道道足以致人死亡的金牌。历史惨痛地告诉我们，文革是人治社会的顶峰，中华民族为之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详见参考文献24）

综上所述，看到亲历者心中发出的呐喊：文革是一场无法无天的“政治恶斗”。

（五）我们在政治狂热、盲从的欢呼声中匍匐倒下

文革中，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受毛泽东的极端政治思维和意识形态的鼓动，很快就狂热起来，盲目地投入疯狂的运动中。而后，迷惑了民众的认知，颠覆了传统道德，丧失了人类的

理性，把野蛮、粗暴、残忍看作为革命行动。只要是伟大领袖发出的号召，人们就真诚地、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地去执行，去做各种荒唐的事，甚至愿为它献出一切，包括生命。政治狂热、绝对盲从就是当年参与文革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幼稚、无知的真实写照。

正如清华大学万润南在其文革回忆录中所说：“在1966年12月，我对文革的认识已经完全认同朱成昭当时对文革的经典概括：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详见参考文献25）

上海复旦大学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安文江在回忆录中说：“迷惑、诱骗在光明正大的幌子下进行，本就缺乏辨别力的我们格外有恃无恐。”

“我把红卫兵比喻为西班牙斗牛。斗牛是悍勇且可悲的。斗牛士用大红布挑逗它，撩拨它，它野性勃发喷着鼻息低着脑壳高翘弯角，冲撞、踢达、搏杀。结果是长矛戳入背脊，短剑穿透心脏，在狂热的欢呼声中匍然倒下！这是我的自画像，也是一代红卫兵的群像。”（详见参考文献26）

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赵慧中在回忆录中也说：“现在可以说真相基本清楚，我感到自己受到了毛泽东的欺骗，当然毛泽东不是欺骗了我一个人，而是欺骗了全国人民。……”（详见参考文献27）

当年清华大学学生领袖之一孙怒涛在文革回忆录中这样说：“回顾历史，我们不仅了解到事实真相，明白了当年的造反派只不过是一群被领袖玩弄于股掌，后又被抛弃清算的小卒子，而且更懂得要在有生之年为民族、为民众尽最后的历史责任。”（详见参考文献28）

当年，我们这一代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时，在没有搞懂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谁是中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问题的情况下，凭着狂热的革命热情，盲目服从，投身运动。五十年后，再回首此事，深感可笑与可悲！当年拼命冲锋陷阵是为了什么？今日终于明白，我们的激情、狂热，我们为之付出的宝贵青春年华，就是被人利用了。我们为年青幼稚、无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然，也丰富了这一代人的生阅历与宝贵精神财富。

（六）文革中充满了极端的政治思维

在文革中到处充满了极端政治思维，也有人取了一个专用名称——文革思维。尤以极左的政治思维充斥全国，上至中央高层，下至普通百姓，文革思维无处不在。极端政治思维最具代表性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和理论，在其思想理论的指导下，文化大革命中的极端大民主和极端的集权专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处于极端政治思维的疯狂之中。

“造反有理”、“怀疑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权力归左派”的口号行动，比比皆是，再现了“湖南农民运动”。

“反对工作队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个人迷信，个人崇拜，造神活动，全国上下遍地开花。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充斥全国。

“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睡在毛主席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打倒×××”的口号与行动随处可见。

还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些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口号，在当年却被人们奉为神明，指导着千万热血、狂热革命青年的斗争行动。

今日反思，回首当年，是多么幼稚可笑，也非常可悲，完全是封建的“愚忠”。

在地院的文革中，同样充斥着这些极端的政治思维。当年我们就被这极端的政治思维的掌门人所利用，不管是哪派，都是其受害人。即地院的各派（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是这极端政治思维下错误路线的执行人，也是受害者，甚至在执行错误路线时，伤害自己的亲人、同学、战友、老师及不同意见者。当然，自己也成为了文化革命“政治恶斗”的“替罪羊”和牺牲品。

时至今日，当年参与文革的我们这一代人，已进入了老年，更应该勇敢、深刻地反思自身在文化革命中的得失、对错，吸取教训，忠告后人，这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众所周知，文革思维——这种极端政治思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特色：

- 1、终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是真理化身，凡是持不同观点的都认为是谬误；
- 2、调一元化的统一认识，排斥思想多元；
- 3、黑即白，两极对立，缺乏平和包容精神；
- 4、不同观念碰撞看作是思想领域里你死我活的斗争；
- 5、一切社会事物都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
- 6、政治妥协视为投降、背叛；

在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这种用阶级定性的极端政治思维的存在，有某种合理性。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人民政府，随着历史任务的变化，执政党的政治思维方式理应发生变化，要从一个革命党的政治思维，向执政党的政治思维转变。因为，这时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是多元化的社会阶层。无论是什么样的党执政，都有一个如何科学地运用手中的权力，使自己得到大多数公众拥护的问题。仅此，就强烈地需要执政党从狭隘的意识形态束缚中摆脱出来，从革命党的阶级定性的极端政治思维方式走向执政党的淡化意识形态的政治思维方式。然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证明：党未能完成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政治思维方式的转变，相反，文革将极端政治思维方式发展到了顶峰阶段。

从以上极端政治思维的六个特点，对照当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作所为，可以看出：整个文革运动中的极左极右，狂热、盲从行动，以及“天派”、“地派”，地院的“保守派”、“造反派”，东方红的“朱派”、“蔡派”派性斗争等的政治恶斗，主要根源之一就是极端政治思维在作祟。这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生态环境下，是无法回避的政治现实。受历史的局限，文革中各派组织，都同是这一错误政治思维的受害者，以至于在掌权后，也带着这种政治思维，不断重演、重犯“政治恶斗”。一旦极端政治思维与没有民主、没有法治伴生，这种极端政治思维伺机就会超越政治红线、法律红线，演绎出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的政治事件。

地院东方红的“朱派”、“蔡派”的派性争斗就是案例之一。这里的“朱派”，是指拥护朱成昭政治观点的人，“蔡派”是指支持蔡新平政治观点的人（公开并固定的人数为8

人)。朱成昭是东方红的一把手，蔡新平是地院东方红成立初期的核心组成员，二人最初的政治观点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策略上有不同意见。朱成昭很激进、胆大；蔡新平偏温和，讲究策略。所以后来朱成昭称蔡新平是东方红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托派”。本来，在同一群众组织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在极端政治思维作祟下，二派分歧日趋严重，以至于完全对立……。 (详见参考文献1)

“朱派”和“蔡派”的分歧起源于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期间。当时，处境困难，朱成昭还是要高调继续留在地质部，而蔡新平主张策略地撤回，这些是东方红核心组成员会上的讨论意见，而随即被地质部的人截获，并扬言要支持蔡新平等等。于是，朱成昭开始怀疑“蔡派”人员泄露机密，造成朱成昭对蔡新平的极度不信任，并称“蔡派”为“托派”，将蔡新平排斥在东方红核心组之外。由于“蔡派”认为不公，双方的对峙有增无减，以至于成立革委会时，仍将“蔡派”成员排斥在外，这显然是有失公平的。这件事在若干年以后才真相大白，事实是，地质部政治部的人当年在东方红核心组开会的小屋，偷偷安装了窃听器，他们完全掌握了当时东方红的所有动态，故意制造东方红分裂。而地院东方红这二派，越来越对立，“朱派”要把“蔡派”打下去，“蔡派”在朱成昭被捕后，也有一些过激行动，如新建广播台，强烈要求院革委会中“朱派”代理人下台等等。双方的派性斗争持续地进行，不断升级。但是当时的极端政治思维占主导，极左思潮盛行，极左的口号与行动会有更大多数的拥护与支持，而温和偏理性的思想，拥护者则少。“蔡派”在地院一直为少数派，好在他们始终未从东方红中分裂出去，避免出现重大分裂与武斗的事端。而在1968年初，在王大宾、聂树人主持革委会时，终于对高元贵、安静中、郑伯让等人下手了，认为他们是“蔡派”的后台，把他们打成“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组织批斗。而对周永璋、孙司权等人进行关押、拷打等残酷的迫害。这些行动触碰了政治红线与法律红线，其性质也发生质的变化。这些当事人在极端政治思维下，不仅伤害了其他人，最后自己也都成为错误路线的“替罪羊”和政治恶斗的牺牲品。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新中国成长的，从小接受的“听党的话”“一切服从党的安排”，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政治思维教育。正是这种党化、奴化教育，我们的头脑已被清洗，使得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文革思维，表现出政治狂热、盲从、崇拜、走极端的政治思维和行为。这正是极端政治思维对我们的毒害，也是我们满腔热情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最后犯错误的主要原因，这是我们必须深刻吸取的教训之一。

（七）中国的政治生态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通过对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全过程的反思，又纵观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历史，得出以下的认识：

人们看不到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的胜利者。所有的参与者，无论是激进的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不管是红卫兵，还是走资派；不管是文革的参与者，还是对文革持有不同意见者；无论是毛泽东、林彪和江青“四人帮”，还是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曾经或最终被抛入“地狱”，文革真是一部“人肉搅拌机”，所有人都失败了，没有胜利者。

文革没有创造出一个新世界，但它确实是结束了一个旧时代。以全民疯狂和苦难为代价，付清了一笔厚重的历史孽债。

文革以中国为舞台，以亿万人民为试验品，进行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改造人性的社会实验，想像要创造出一代无限忠于、无私奉献的人，但实验失败了，新人未出，旧人不在了。

当年响应号召，积极跟随毛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参政者都没有好下场；反过来，有独立思考精神，对文化大革命持有不同意见的议政者，同样也没有好下场。在这种“政治恶斗”“群众专政”的形势下，人民群众失去了参政、议政的热情、勇气和路径，被推到了政治之外；唯有选择是：远离政治、自我保护，保持“沉默”、“等待”……。 “一切为了权力”、“一切向钱看”的政治生态奇观逐渐出现。这也许就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态的严酷的现实。

文化大革命最大的失误和损失之一就是：中国的政治生态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 1、文革摧毁了长期塑造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人民心中的“伟大形象”；
- 2、文革摧毁了对长期灌输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
- 3、“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残酷的屠刀在文革中罪恶昭彰；
- 4、一切为了权力而奋斗的、无法无天的“政治恶斗”和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既伤害了广大百姓，也伤害了官僚集团；
- 5、整个国家的管理、治理秩序遭受严重破坏。

正如杨继绳所说的：

“文革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历史的组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加。多种力量、多种角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维度和广阔空间维度中反复角逐、多次变换。各种思想、各个群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既有反反复复的斗争，又互相交织，相互纠结。某一个时段上的胜利者，在另一个时段上是失败者；某一时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时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过整，挨整的人也整人。用‘肯定’还是‘否定’这个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不可能记录和评述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详见参考文献36）。

这里，我们不是希望要重新恢复和重塑过去的时代，这也是不应该的。因此，应该正视目前严酷的政治现实，去重建中国新的政治生态势在必行，但是这种心理上深深的创伤，要予以抚平谈何容易，必须要有政治上的大智慧。

◇ 结束语

回顾五十多年前，我们都是抱着忠于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的信念，走进了文化大革命，可是谁也无法意料到最后的结果：包括以学生为主的群众运动头头在内的一大批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制、惩罚、批判以至于坐牢。我们为年青、政治上狂热、盲从、崇拜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但是，我们也感到幸运，在我们的一生中能赶上这样一段非常时期，亲历了这么多的政治斗争，历练了我们，收获不少的教训。

至少，我们懂得了：要认真读书；要实事求是；不盲从、不狂热、不崇拜和不迷信；要有独立思考精神。我们学会了：要不断追求真理，求真摒假；我们懂得了：人要有高尚的人格，有大爱之心；我们懂得了：要敬畏生命、尊重人性，要有法治；我们不会对整我们的人以牙还牙冤冤相报，我们要对被我们伤害的人，心怀愧疚、道歉赔罪。我们也看到：人在春风得意、目空一切时，就是犯错误的开始……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怀念我们敬爱的高元贵老院长。当年工作队进驻地院，就是带着“舍高保聂”的目标。工作队进驻短短几天，高院长就被迫做检查，被批判、撤职。而在以

后批斗“走资派”时，他又是被批、被斗。而我们走近老院长时，没听到过一声埋怨。迁校时，是他决断选定校址，才有美丽的武汉校园；朱成昭释放后，他承担了给朱成昭等人平反的工作。整“五一六”结束后，他尽力去帮挨整的学生平反。他对地院充满着爱，对地院学生充满着爱。不管是到他家抄家的学生，还是批斗过他的学生，他都那么平和、亲切。他总说，地院的学生对他好，批斗时从不动手，外单位人批斗他、打他，都是地院学生在护着他。在改革开放初期，高院长不接受高教部安排他去南大或南开当校长，他在等待，等哪一天北京地质学院恢复了，他继续当北京地质学院的校长……

我们还要缅怀安静中等一批已离开我们的老师。正是有这样的校长、干部与老师，培育了一大批朴实、认真、爱思考、有独立思考精神、有爱心品质的地院学生，才会在文革的大潮中表现出与其他学校明显不同的结果。

我们要永远怀念地院所有在文革中因各种原因而逝去的老师、同学！

最后感谢地院的许多老师和同学，你们奉献出你们对地院文革的回忆，或献出珍贵的历史文献，让我们依据那些资料，编写完成了本文，这是我们给世人、给后人奉献上的，我们亲历的文革历史记录，以作为了解这个非常时期的参考史料。

2016年6月5日初稿，2017年3月1日定稿

参考文献

- 1、聂树人：《地院东方红兴亡史》，2011年12月香港出版
- 2、伏庆是：“我与北地文革”
- 3、宋翔雁：“我在地院文革中的回忆”
- 4、万天丰：“回忆六二〇事件”
- 5、王大宾：《王大宾回忆录》，2015年10月香港出版
- 6、田春林：《田春林文革回忆录》
- 7、陈永迪：“我亲历的揪彭德怀行动”
- 8、谭保华：“北地东方红抓彭德怀进京纪实”
- 9、钱佩娟：“忆江祖如和地院文革”
- 20、张运钧、李颖：《晚秋沉思》，2012年12月香港出版
- 11、孟繁华：“打倒私字，实现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首都红卫兵》报1967年1月25日）
- 12、蔡新平：“记忆中的肖力与北京地院文革”
- 13、程关林：“被遗忘的群体”
- 14、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 15、聂树人：《“三司”与“首都红卫兵”》，2013年12月香港出版
- 16、聂树人：《北京天、地派的争斗》，2013年12月香港出版
- 17、殷惟侯：“北京地质学院文革点滴回忆”
- 18、聂树人：《“一打三反”与“抓五一六”亲历记》，2014年香港出版
- 19、周永璋：“关于文革中有关问题”
- 20、梅建明：“我与朱叶反党集团”
- 21、许爱晶：《清华蒯大富》，2011年3月香港出版
- 22、古宝琳：“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
- 23、米鹤都：《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2011年3月香港出版
- 24、黄瑞和：“文革、清华、人性”（《清华十年文革反思集》）

- 25、万润南：“文革中的清华岁月”，2007年12月
- 26、安文江：“我不忏悔——一个红卫兵司令的自白”，1999年3月
- 27、赵慧中：“对北师大文革的几点看法”，2016年2月
- 28、孙怒涛：《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后记，2015年香港出版
- 29、11622班“聂沙华”大字报：“党委的检查过不了关”
- 30、安静中大字报：“放下包袱，投入战斗”的呼吁书
- 31、江祖如等人大字报：“致全院师生员工的公开信”
- 32、王大来、陆炎德等24人大字报：“大家来讨论，这是为什么？”
- 33、朱成昭等人（爆破战斗队）大字报：“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 34、“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宣言”，1966年8月17日
- 35、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2013年10月香港出版
- 36、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革的思考”

□ 原载张运钧、李颖编《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

~~~~~

### 【我看文革】

#### 文革五十二年再思考

• 李伟东 •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1976年10月），是由毛泽东为巩固他的当代皇权式统治和选择可靠接班人而在中共内部主动挑起的以清洗政敌为目的的高层内斗，并以“文化大革命”（将全民的文化思想彻底马列化、革命化和愚忠化）的名义，动员政权专政力量和裹挟所有所谓“无产阶级”（工人农民）及学生军人知识分子一起协助毛整肃自己的假想敌人、并使全体国民在“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口号下，彼此互相猜疑指控和厮杀了十年的浩劫式群众运动。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损失、文化文物的彻底毁灭和极度贫穷。

文革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化进步运动和所谓大民主，它恰恰是一次对人类文明的彻底反动。

#### （一）当代秦始皇为选择“可靠接班人”而发动的十年内斗

由于苏共20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有限清算和中共党内毛刘经济路线的日益分歧，使毛逐渐怀疑刘少奇就是隐藏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因此动用他的近乎皇权加神权的无上权力发动群众跟随他一起“清除埋在身边的定时炸弹”，并启用林彪、江青文武两大集团协助他一起清算和打倒“刘邓集团”及所有“走资派”，并先后将林彪和王洪文确立为符合他共产主义乌托邦路线和“绝对忠诚”的接班人。但由于他的猜忌和内斗惯性，毛最后还是逼死了与他发生路线分歧且个性强硬的林彪，废黜了庸碌的王洪文，确定了一个近乎家臣的集团（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辅佐江青毛远新）来接班。但最终还是被华叶汪以“宫廷政变”的方式推翻了他的接班计划和启用邓小平推翻了他的乌托邦文革路线，开始了改革开放。毛不惜发动文革来选择可靠接班人继承他的乌托邦理想，最终却以“立储”和文革双失败而告终。

#### （二）无产阶级专政和文革大屠杀

文革虽然以高层“立储”内斗为主线，但对全社会的后果之一却是一场堪比纳粹大屠杀的世界级的大屠杀，所不同的是，纳粹大屠杀是以种族的名义，而文革大屠杀则是以消灭阶级敌人的名义。中共建政之初就以消灭阶级敌人的名义屠杀了数百万国民党政权的军政人员和富裕农民，但毛仍然时刻怀疑上述残留人员和他们的后代要翻共产党的天，因此借着发动文革的契机，再次掀起了对所谓地富反坏右的大屠杀，而且间歇性地借口不同地屠杀了十年，并且将屠杀的权力胡乱下放给所谓群众专政组织和怀疑对立派系是阶级敌人的武斗组织，党的各级组织也以清理阶级队伍或抓特务及抓异议分子的名义经常实施大屠杀。文革十年至少造成了130—300万（不同的统计来源）的人命损失和数以千万计的人员伤残。纳粹大屠杀早就被清算和反思了，而文革大屠杀却被湮没至今。这真是悲剧中的悲剧。

### （三）“砸烂一个旧世界”

文革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化进步运动，而是人类文明的毁灭。为了创造一个以毛为唯一神祇的“红彤彤的新世界”，中央文革小组公开号召红卫兵开展“破四旧”运动，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红卫兵几乎毁掉了包括孔庙在内的所有文物古迹、历史名人墓葬（很多被爆尸）和寺庙教堂及书画遗存，抄没和烧毁了大批图书，修改了无数街路名称，批斗和摧残致死大批文化名人和宗教人士，打杀了数以千计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并抄没了他们的财产，全国各大中小学校都在批斗殴打羞辱老师，并疯狂地攻击外国使馆，制造了震惊世界的“红色恐怖”。

### （四）毛式“理想国”：斗私批修做新人

所谓“文化大革命”即迫使所有人自我改造成“革命新人”的“灵魂再造运动”，它要求人们“狠斗私字一闪念”，对毛要“三忠于四无限（热爱）”，要“早请示晚汇报”。毛要把全国人民都变成雷锋式的只忠于毛又完全无私且对阶级敌人无比仇恨的“好战士”，并通过“斗私批修”来约束干部的蜕变腐败。这已经近乎于一场迫害人类精神的邪教运动。尽管如此洗脑，仍不能改变因共产极权体制所带来的天然腐败趋势。以当时的生产能力和财富水平作对应分析看，文革时代的中国同样是个相当腐败的社会（各种利用特权对私利的攫取遍布全国）。而毛自己就是那个带头腐败的领袖。

### （五）毛式“理想国”：经济乌托邦

文革是继“大跃进”后又一场裹挟全民挑战人类基本经济规律的失败试验。为了争夺斯大林死后国际共运的头把交椅（领导权），毛号召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全国掀起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包括虚假的高产竞赛、粮食高征购和“放开肚皮使劲吃”的公共食堂等一系列荒诞政策），最终导致连续三年的经济崩溃和大饥荒（至少饿死3000万农民）。毛在遭到党内轻微批评后，对他的经济路线的失败仍不服气，不惜以发动文革的手段全面清洗打倒批评者，同时再次发起向高级“社会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冲锋，将整个经济再次拖向崩溃，也使中共在中国的血腥社会主义实践归于彻底失败。

### （六）毛式“理想国”：“创造一个新世界”

中国的文革从一开始就有向全世界扩散的趋势，因为毛要把自己打造成“全世界人民心目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文革这种输出革命的极端形式（包括向全世界大量发放各种文字的毛的“红宝书”和给予柬埔寨、日本、法国、越南等国共产党和香港地下党大量的资金和武器支援），确实给相关国家带来了动乱和灾难。特别是柬埔寨红色高棉这个中共始终支持的

红色恐怖组织，在柬埔寨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并得到了毛的称赞，成为中国文革外部化的极品国际试验。中国的文革是国际共产主义乌托邦运动的悲剧性高潮，从此这一“通向奴役之路”遭到人类的普遍质疑并在全球开始退潮。但时至今日，毛和文革所造成的国际灾难无人负责、道歉和反思。

#### （七）初步结论

1、文革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共产主义乌托邦梦想与中国秦朝以来帝制轮回周期相结合的一次历史悲剧，它由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泽东（当代无冕秦始皇和马克思乌托邦的狂热信徒）所发动，直到他去世才得以结束，造成了无数的人间惨剧。由于毛身上混合着秦始皇、朱元璋、洪秀全的诸多特质和中国古代乌托邦的幻想，使这场所谓革命充满了帝王阴谋、小农幻想、痞子张狂、无政府主义和操纵群众的混合破坏力，将中国的文化传统破坏殆尽。

2、文革是一场堪比纳粹大屠杀的世界级的阶级大屠杀（包括柬埔寨的悲剧在内）。

3、文革中并不存在所谓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只有毛的左膀右臂文武两个帮凶集团（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他们在毛的领导下形成一个完整的反人类集团，是文革的罪魁祸首。中共1981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全面否定了文革，但其历史结论文过饰非，不符合真实的历史逻辑。

4、对林、江两个集团的刑事审判并没有体现历史正义（虽然他们罪有应得），而且颠倒了历史正义，给毛推卸了责任。至今没有公布整个文革浩劫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没有向人民道歉和赔偿，没有对无辜死难者的祭奠和纪念，没有对作恶者（包括那些民间的普通法西斯）的普遍清算。对两个替罪羊团伙的审判，只是被打倒的官僚集团卷土重来之后的一种狭隘的只站在本集团利益上的复仇而已。

5、文革中不存在什么“人民文革”的插曲，也没有什么“大民主”运动。只有领袖运动群众，群众奉旨造反而已。

6、文革初期的以扩大阶级斗争，更加疯狂地屠杀所谓地富反坏右，同时保护老干部为特征的所谓老红卫兵运动（即所谓另类文革，后来被毛改变方向，“纠正”为打到党内走资派为主），与今日中国的极权主义和文革回潮有着天然的历史传承。

7、十三年文革和三个文革：文革实际始于1965年，至少应从5月批判三家村开始，到十一月发表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又掀起一个小高潮（江青他们从2月就开始在上海组织这篇文章），到1966年4月16号撤销《二月提纲》和彭真的文革五人小组并把批判矛头转向批准《二月提纲》的刘少奇，可以说是完成了文革的初始阶段和江青对文革领导权的抢夺，或者说从彭真刘少奇式的文革（反右派为主）过渡到毛式打党内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16通知只是正式以中央文件形式宣布开始毛式文革，让大家忘记了前面还有一个刘式文革，但在那之前文革的主要形式都预演了。5月16通知后实际是老红卫兵最后一次回光返照，然后主角就成了造反派。因此说，文革实际始于1965年，并且有刘式和毛式两个文革的博弈，以毛胜刘倒（及大批红二代成为狗崽子）告终。1976年，毛死后，华国锋的两年两个凡是还是在延续文革模式，并且欠下文革式血债（李九莲许云峰等），可以称为毛后文革。因此文革有三个，实际持续13年。

8、刘式文革由邓式复辟，邓式改革开放的同时，实际一直存在刘邓式文革的悄然继续，包括老干部复辟，还乡团不道歉不反思，把一切责任推给四人帮，整三种人和阶级斗争式的严打，及开启以权抢钱的腐败进程和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直至六四镇压的刘邓式阶级斗争。

9、习近平说不走老路，虽然他保留或重新祭起了很多毛式原教旨的东西，但他骨子里却不是要恢复毛的文革（让群众帮助整垮他的党内对手并开启全社会乌托邦进程），而是要建一个纳粹式的可以与美国争霸的红色帝国。

作者附记：本文是文革五十周年时，作者为天问学会文革图片展写的学术提纲，当时曾发表于《世界日报》。现在原文基础上将近两年的思考补充进来，在第七部分增加三点结论～即7.8.9三部分，但英文没有扩展。

□ 原载《文化大革命定性学术研讨会专辑》，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2018年9月  
~~~~~

【往事非烟】

《云卷云舒——清华笔记》（选载之二）

• 傅培程 •

第一章 文革在清华

五、清华园二校门在我眼前倒下

清华大学礼堂前，在东西南北主轴线的交点上，有一座标志性的建筑物——清华园二校门。这是一座类似牌坊似的建筑物，两边各有两根白色园柱，灰色砖墙，有三个门洞，中央上方清朝那桐写的“清华园”三个黑字苍劲雄厚，极具魅力。它是原皇家园林“清华园”唯一保留下来的建筑物，清华大学也因建在“清华园”内而得名清华两字。所以二校门是清华大学的标志，是清华的“镇校之宝。”不知多少图片，明信片都有它的倩影。每逢节假日，二校门处里三层，外三层的放满了鲜花，没有一个清华学子不在二校门下留过影的。

这么一座美丽而带有历史韵味的建筑物在一九六六年夏遭了大难了。造反派说它是“封建皇朝遗留下来的四旧”，说它是“旧清华”的标志，必须将它拆掉！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是“四旧”吗？那么天安门不是封建皇朝留下来的吗？万里长城建于秦始皇朝代，颐和园是封建皇帝的园林，难道将这些都拆掉吗？这连小学生都懂的道理、可是在一九六六年的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里却是无理可讲。

那是一九六六年夏日的一个晚上，大家都知道当晚要拆二校门了，二校门周围有一大群人在围观，我也是其中之一。只听到一阵轰隆隆大功率马达声，造反派开来了一辆重型卡车，他们将钢绳套在二校门柱子上，卡车往南边拉，轰隆隆一声巨响，这座清华学子心目中神圣的建筑物，连八国联军、北洋军阀、国民党都没有碰它的建筑物，在我眼前轰然倒下！飞起一阵巨大的尘埃。

这时红卫兵押来一队清华的“黑帮”，命令他们搬掉倒下的废砖，指定他们往东边跑，搬不动的就打，跑不快的就用皮带抽。当时的血腥暴虐已将清华的“黑帮”们迫害惨了，所以一个个拼命搬，奋力跑。

我在东边的树丛下看到一个四十来岁的女“黑帮”，她相当瘦弱，实在是搬不动了，腰已弯成弓一样，还挣扎着、踉跄着往前跑，脸呈死灰色，随时可能倒下去。我悄悄的在树丛掩护下，给她拿掉一块十多斤重的水泥块，她感激的向我猛点三下头，又跌跌撞撞往东面跑去。那天晚上，清华园的“黑帮”们在皮带伺候下搬空了全部二校门拆下的废砖。

据传，拆掉二校门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给毛泽东塑像让地。后来真的在原二校门的位置上建起了一座比二校门高大得多的花岗石毛泽东立式塑像，塑像坐北朝南，毛泽东高举右手。

文革后，这座巨大的毛泽东塑像又拆掉了。

古哲人老子讲过：“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其意思是说，美妙的音乐是少声的，高大的形象是无形的。一个形象如果真的是高大的话，并不需要劳民伤财用很多花岗石、大理石去堆砌的。

清华人搬掉毛泽东巨像后，又在原址重新修复了清华园二校门，其大小尺寸、造形用材与原建筑物一模一样。如今，重建后的二校门仍然英姿焕发，四周仍是鲜花围绕，海内海外的清华学子们心中都明白：这块宝地，非清华园二校门莫属！

六、这是一只山羊吗？

自古以来，首都京城称之为“天子脚下”，其法治、社会治安、对人身安全与尊严的保障应为天下诸城之楷模，人民共和国不兴讲“皇恩浩荡”，但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起码的人身安全总有保障吧？然而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的首都北京已充满了血腥味儿，到处是对人基本生命的虐待和侮辱，有的是光天化日下的残杀。

称之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清华大学理应是文明礼仪之地吧，因为其是培养国家精英的地方。然而“文革”中的清华大学，对人生命与尊严的摧残是令人震惊的！一九六六年夏日的一天，同班同学小胖子回宿舍来告诉我他在清华水利系系馆门外看到的一幕：

一九六六年夏日，清华大学的“黑帮”们被关在生物馆的地下室里，不时地被拉到各个系去批斗，暂时不批斗的也要拉出去劳改，扫厕所等。

那是夏日的中午时分，小胖子经过礼堂东边清华水利系系馆门口，只见系馆外面的灌木树丛绿叶茂盛，树下是绿茵草地。突然小胖子看到矮树丛中有伏在地上白乎乎的一团东西，是一只山羊！因为这白乎乎会动的物体有一根绳子拴在树上。肯定是一只山羊！在校园里发现一只可爱的动物是十分令人兴奋的，真难得！要看看它是怎么在吃草的。特别在这血腥的岁月里，羊与人比，它是显的这样的忠厚老实，平和可亲！常常制造血腥的人类什么时候才可以“进化”变成羊呢？

走近一看，原来是个人！他穿一件白衬衣，脖子上拴一根绳子，绳子另一头拴在树上，他伏在树丛中拨草，远处一看，误以为是一只山羊。边上几个红卫兵正在捉弄他：

“把那几粒石子拣过来！”红卫兵命令他。

“是，是，我拣过来！”他连声回答，十分顺从。

说着，他把几粒指甲盖大小的石粒拿到红卫兵指定的地方。红卫兵又发话了：“拿回去！”

“是，是。”

他又赶紧将这几粒石子拿回到原来地方去。几个红卫兵哈哈大笑，他们能叫这个老头团团转，能非常有效的指挥他，那怕叫他去捉只蚂蚁都办的到，十分高兴和得意。

“他是谁你知道吗？”一位旁观的同学指着这老头问小胖子。小胖子说不熟悉他，好象没有见过。

“他就是水利系系主任张光斗”！这位同学告诉小胖子。张光斗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一级教授、水利系系主任，是国内外闻名的水利专家。今天竟被象一只山羊一样拴在树上！在水利系馆外劳改。

那时候，清华大学的“黑帮”们全被关在生物馆的地下室里，白天拉到各个系去斗、去劳改，晚上再关进去。那天可能又把他拉到水利系馆来劳改。脖子上的这根绳子不知是天天这么拴着的呢？还是这天哪个恶作剧的人给他临时拴在脖子上再挂在树上的？尚不清楚。

据说张光斗在中国水利界权威赫赫。有一次他与某大型水利设计院意见不一致，最后周恩来总理还是听从了他的意见。

一位清华大学老校长讲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象梁思成，张光斗都是清华大师级人物。清华有这样一批大师级人才，加上一大批中青年科技精英，才造就其在中国教育界和科技界的显著地位。这样大师级的水利权威、学界泰斗，今天竟象一只山羊，脖子上套着绳套拴在树上！

自从人类有大学以来，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也找不出脖子上套着绳子拴在树上的一级教授和系主任！中国清华大学的张光斗教授就是一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真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一切史书黯然失色！

七、把屁股竖起来的人们

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间，正值炎夏。清华大学校园内树木茂盛，草地碧绿，昔日的皇家园林不失其美丽和优雅。可惜在这美丽的校园里充满着血腥味儿。

那是一个中午的时分，我从气象台走向生物馆去西校门。生物馆前有一座桥，在桥南边的草地上，我见到有一排跪着的人们，有男、有女，约有十几个人，有二十几岁的年轻姑娘，也有五十多岁的长者，周围有不少人在围观，一群穿军服的手持军用皮带的红卫兵正在体罚这批跪着的人。

周围有人告诉我，这批跪着的人是清华大学附属技工学校的领导和部份教师。

这时一个红卫兵发话了，他慢条斯理地摇着手中的皮带，拖着长音缓缓地说：“把屁股都竖起来……把屁股都竖起来……”

跪着的十几个人听了这个命令，都开始把自己屁股竖起来，象升降机一样，动作还很整齐。十来个人把自己屁股都竖的高高的，身子都在颤抖。这时候，这群红卫兵排着队从跪着的人群边走过去，边走边用带钢扣的军用皮带狠狠地一人一皮带抽在高高竖起的屁股上！每

个红卫兵一次走过去要抽十几个“黑帮”的屁股，而每一个“黑帮”的屁股要承受十几个红卫兵一人一皮带的抽打！这是“流水作业”，每个人屁股上落下的皮带象雨点一般。一边这样抽打，一边红卫兵还吼叫：“不准哭！谁敢哭专门打谁！”

这皮带钢扣落在人肉体上发出滞重的“哒”，“哒”声，令人心颤，令人发指！红卫兵们转着圈在抽打。

一会儿，竖着的屁股上透过衣裤都渗出血来了，其中一位二十多岁的长的很文静美丽的女“黑帮”实在支撑不住了，终于一头栽在草地上倒下了。于是在“你想装死就专门打你”的吼叫声中，十来条皮带全落在她身上！顿时痛的她满地乱滚，鲜血从上衣和裤子各处渗出来，她嘴角里喃喃地发出微弱的声音：“别打了……别这样打……”

围观者都不忍心看下去，那是十分确切的“惨不忍睹”四个字！但是围观者如果谁敢说一个“不”字，谁就会顿时丧生在暴力之下。红卫兵正在“紧跟毛主席干革命”，正在执行林副统帅“把牛鬼蛇神，走资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命令，你敢阻拦吗？你敢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除非你不要命了。

一位旁观的知情人告诉我：“这个年轻的女‘黑帮’，是刚毕业的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留校分到清华技校去当教师，因为抄家时抄到一张她与男朋友相拥的照片，硬说她有‘黄色流氓罪’，说她是‘清华的黑苗子’，把她弄到黑帮队来折磨”。

听了令人同情。清华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是相当不容易的，那时候清华大学一年才毕业一千多名学生，其中评为优秀毕业生的也只有二、三十人，由蒋南翔校长亲自给他们挂上优秀毕业生奖章。那位衣服渗出鲜血的文静姑娘倒伏在草地上颤抖，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的奖章还没有捂热，就倒在了母校的草地上。

人们为清华技工学校饱受虐待的干部和教师们深鸣不平！人民共和国制订了那么多法律，颁布了厚厚的宪法，首都有那么多的公安民警和派出所，竟不能在文明之地的清华大学校园内保护人民基本的生命和人身的安全！在共和国首都的“天子脚下”，在世界闻名的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的校园内，他们的鲜血染红了美丽碧绿的草地！

八、二号楼下跪着的曹君

清华大学的二号楼是座颇有名气的学生宿舍，黄色的砖墙，中国古建筑的屋盖，楼中央有宽大门厅直通北面的一号楼，二号楼东西两侧是四层楼，中间是五层楼，其门窗线条都带有中国式的古典韵味。土木建筑系的男生们都住在二号楼里。

一九六六年的夏秋，正是北京处在血腥恐怖的岁月中。有一天，我进二号楼中央门厅准备到四楼自己的宿舍去。突然发现中央门厅过道上跪着一个学生，一群人正在围着打他，有用脚踢的，有用拳击的，他老老实实的伏地而跪，默然无声，无言无泪，忍受着众人的殴打。为了保护自己的头部，他用双手反抱着自己的后脑勺。

也许是打疼了，他脑袋痛苦地往一边躲闪，我终于看清楚了他的脸，他是土木建筑系建六班的曹君！听打他人的漫骂声，我也听明白了，曹君的“罪状”是：

“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写小说攻击江青同志”。

“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反动学生！”

据周围人讲，一九六四年北京大专院校搞政治运动“九评学习”时，搜出了他的一本未完成的小说稿，其中有攻击江青的内容，依此他被定为“反动学生”。

长期以来，极左政治对人民以言论和文字进行惩处或定罪的行径始终没有停止过，被打成“反动学生”的人，他们所谓的“罪行”就是言论，这“言论”两字恰恰又是宪法保证了的公民权利之一。在中国的各部刑法里，找不到关于“反动学生”的定性和刑律，而实际运作中，极左政治常对学生以言论和思想等定罪，将不少学生戴上“反动学生”帽子，进行劳改和流放等惩处。

曹君的另一条“罪状”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他父亲是国内资深捷克文翻译家，国内懂捷克文的并不多，“文革”中其父深受迫害，被红卫兵打的死去活来，多次被抄家，一家人从原居住的被赶了出去。一天，曹君父亲被红卫兵打的实在跪不住了，倒下的话会受到更严重踢打，曹君身为人子，心痛父亲年老体残，遍体伤痕。于是爬过去跪在父亲身边，让父亲靠在他身上别倒下去，用伏着的背去支撑父亲摇摇欲倒的体躯。这举动大大触怒了红卫兵，大骂他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纷纷用皮带狠抽他！曹君乐意挨这些皮带抽，这样抽在他父亲身上的皮带可以少一些。曹君的孝心终不能救下他父亲，他父亲还是在“文革”中含冤去世。

家中大悲剧，校中又大苦难，在二号楼下遭众人拳打脚踢只是他苦难人生的一曲而已。一九六八年，曹君以“反动学生”，“敌我矛盾”的“罪状”，被取消毕业生资格，押去农场劳改。“四人帮”打倒后几年，他才得以平反。

九、深夜来敲房门的少女

大学时代我住的宿舍是清华大学二号楼中间楼梯对门的443房间，这是一间大宿舍，里面要住八个同学。一九六六年夏，二号楼四楼东边空出一间三人间宿舍来，我们乘这“天下大乱”之际，也没有经过谁同意，我和G同学两人铺盖一卷就搬过去住了。从八人间换到三人间，这味道别说有多好！比住别墅还美。每人有张独立的属于自己的桌子，（大房间四人合一张大桌），各人书桌上方拉一只电灯，瓶子做的笔筒里插上好几支笔。G君说的好：“我们班主任也就这个标准嘛！”

尽管天天喇叭乱叫，外面已乱成了一锅粥，我们还是躲进小屋享受了三人间的美妙。

一九六六年夏日的一个深夜一、二点钟，我被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惊醒，有谁会来深夜敲门？我走到房门口，听到的竟是一个少女急促的声音：“哥……哥……”！

我打开房门，一个十三、四岁的农村少女站在门外。“我要找我哥，别人告诉我他住在这个房间”。

少女说话时抖抖颤颤，极度惊慌。她一口标准的北京味口音，与G君长的极象，我顿时感到出事了！忙拉开灯，叫起G君，G是北京郊区县人。他一看，竟是自己的同胞妹妹！急忙拉她到里面坐下。小女孩一见到自己哥哥，顿时扑过去抱住哥大哭起来，我们怕被别人听见，忙关上了房门。

小女孩从北京郊区县农村走了一百多里地落荒而来，她哭诉着：“现在北京郊区有的地方开始用刀活活砍杀地主和富农，有的全家都被杀掉了，我爸是地主，已斗了好几天了，也被打的够呛。每天夜里有人用砖头砸我们家窗户，听到风声说这两天就有可能要杀我们全家了，爸妈领着妹妹从玉米地里逃走了，爸叫我到城里来找哥，说一家人一起逃命目标太大，容易被抓住，不能全给抓住杀了，分开逃走会大一些。我不敢坐车，怕碰到村里熟人给抓回去。我只知道清华大学在西边，我就看着太阳走，不知走过了多少村子，也不知问了多少人，我从昨天上午假装卖菜逃出村来，十多个钟头了，我终于找到哥了，我都一天一夜没有吃饭了……”。

小姑娘说着已哭的不成声了，两脚都是泥，鞋已不成鞋样子，头发乱成一团，双眼是极度的惊吓。我们也真是贫困，找遍房间连一块饼干、一块咸菜也找不到。G君倒了一大杯开水给妹妹说：你先喝着填填肚子，天亮了哥给你找吃的。小丫头一口气将一大杯凉开水全喝了。

我俩紧急商量此事，清华园哪是避难的地方呀？天一亮，如果被发现，立即会追查她身份，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这里是藏不住一个大活人的。我们分析了形势后，兵贵神速，G君领着妹妹，乘天还没有亮，悄悄离开了学校，躲到城里一个远房亲戚家去了。

这深夜来敲门的少女讲述的情况使我一夜睡不着觉。北京真是乱了套了，一个国家的首都郊区县居然可以刀劈活人？“天子脚下”的京城之地居然可以不经法律就杀人？这是历朝历代的封建皇朝都没有出现过的乱政和暴虐！自古以来，瞎编故事的人都不敢这么编，怕没人会相信。可是一九六六年的北京郊区，却是活生生的事实！这位深夜逃来清华大学的少女讲述了北京郊区血腥的真相。

自从毛泽东多次在天安门城楼挥舞军帽接见红卫兵以来，自从人民日报发表林彪讲话：“把地、富、反、坏、右、一切反动派、走资派统统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之后，全国的血腥暴虐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每晚有不少卡车在北京街头收尸。

血腥的行为终于出了恶果，一个家里被砍杀的地主儿子在北京城里用刀砍了一位外国使馆的秘书夫人，产生恶劣的国际影响。这么下去后果不得了，于是当局才赶紧制止北京郊区农村里乱杀地主和富农的血腥事件。

这位深夜来敲门的少女，我同学G君的亲妹妹，象她这样的花季少女，照例说正是鲜花般美丽的人生，可是一九六六年的她，正在刀口下逃着命！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土地上，又发生着多少这样的悲剧？！

十、彭德怀和箩筐抬来的罗端卿

“文革”中的清华园，实在是热闹非凡。大礼堂周围是中心区，礼堂前面左右两条路旁全是用席棚搭起来的大字报墙。这大字报区晚间灯火通明，人是里三层，外三层，中国的重要政治动向在清华大学的大字报墙上时刻都会有所反映。

清华大学的大礼堂，虽然只有一千多个座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已成了世人瞩目的政治活动中心。天天晚上，各种批斗会、辩论会、报告会在大礼堂里举行，而且礼堂大门洞开，随便进出。礼堂前的大喇叭天天播放着里面发生的一切：长篇的发言、声嘶力竭的叫喊、口号声、争辩声…这些都通过高音喇叭充塞在清华园的上空。

一天晚饭后，我和几个同学正在看大字报，礼堂前的喇叭又响了，说今晚七点半，在大礼堂批斗军队“黑帮分子”彭德怀和罗瑞卿，希望同学们踊跃参加。

在庐山会议上敢于上书毛泽东，敢于为百姓鼓而言的彭德怀在人们心目有很好的印象和神秘感。都很想一睹真颜，看看这位元帅长的怎么样？于是随着人流我和几个同学也进入了礼堂，找一地方坐下。一会儿广播响了：“把‘三反’分子彭德怀押上来”！

台下人头攒动，都往台上看，几个红卫兵押着彭德怀上台来了！彭矮胖身材，穿一件黑色中山装，下身是黑色裤子，身体壮实，腰板挺直，很具军人气质。印象深的是彭的嘴唇有点厚，胸前挂了块“三反分子彭德怀”的打了红叉的木牌子。他稳健地站在礼堂台上的左侧。喇叭又响了：“把三反分子罗瑞卿押上来”！

只见个红卫兵抬着一只大箩筐上来了，这是什么？分馒头吗？这箩筐里装的是什？大家正在惊奇疑惑之中，一个红卫兵双手从箩筐里一提，揪出一个人头来，又一提，拉出半个人身体来，原来箩筐里装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原公安部部长、声名赫赫的大将罗瑞卿！这时他双腿已经断了，所以用箩筐抬来批斗。筐里的脑袋动了，罗瑞卿扬起了头，他脸色安详，目光灼灼四射，带着微笑，正面环视一周礼堂下黑压压的人群。此神态象是将军在检阅列队的士兵！

接下去是批判发言，无非是乱喊乱叫、诬陷造谣一套、没有人会去专心听这些内容。一个半小时后，批斗会结束了，会议主持人责令彭德怀、罗瑞卿两人三天内交出书面检查材料。这时箩筐里的罗瑞卿说话了，由于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主持人将话筒拿到罗面前，原来罗瑞卿说的是这么一句话：“三天内写不出来！”

会场内全听到了这句话，引起一片大笑。会议主持人相当尴尬，于是一片口号声：“罗瑞卿不老实”！“打倒三反分子罗瑞卿”！

同学们很佩服躺在箩筐里罗瑞卿的大无畏精神。中国古圣人孔子有句名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罗在告诉大家，他志不可夺。

一片乱喊的打倒声有什么用呢？罗瑞卿不是已躺在箩筐里了嘛，双腿都已断了，但屈服了吗？显然没有！

批斗会草草收场了，两个红卫兵将箩筐抬了下去。罗瑞卿灼灼的眼神，微笑的神态、不能交出检查的回答。彭德怀坦然处之，无动于衷的神气，元帅和大将不屈服的情景给清华学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次批斗会使我有幸见到了彭德怀元帅，在共产党人中，彭德怀是很得人心的，在全党头脑发热，大搞‘大跃进’、‘公社化’、吃食堂、放卫星的岁月里，他敢于上书毛泽东，为受苦的百姓鼓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有句名言：“千人之喏喏，不如一士之谏谏。”

其意思是说一千个唯唯喏喏的人，不如一个直言敢谏的人可贵！

可惜，毛泽东将善于“喏喏”的林彪选为了接班人，而不喜欢彭德怀的“谏谏”。并对彭治以了重罪。“文革”中彭德怀，罗瑞卿等受尽磨难，在清华大学挨批斗，那只是一幕而已。

十一、京城探险

一九六六年夏日，北京进入到了“破四旧”的高潮中，各种暴力现象十分普遍。在清华大学校园里，时有发生伤害人体的暴虐行为。同学中也众说纷纭，说北京城里已不得了，好多人给打死了，好多老店招牌都给砸了。我突发奇想，想骑自行车进城去转一圈，来个“京城探险”，亲自目睹一下现状才眼见为实。于是我换了一件破衣服，骑车进城去了。出校门不久，在五道口铁路边上就看到了令人心悸的场面：

一个十五、六岁的端庄少女，穿花长裙，白色半袖上衣，脖子被套着一根很粗的麻绳，哭的泪人一般，麻绳的另一端是一群年青的小伙子在拉着她走，女孩不肯走，背后另有一些人在推她，女孩的两手紧紧地抓着脖子上的绳套，害怕拉的太紧了会把她勒死。一路哭着推推拉拉过去。

十五、六岁的花季少女，不可能是走资派，也不可能是反革命，从她端庄美丽的脸上可以看出，这是个善良的姑娘。她犯了什么罪？要这样脖子上套根粗绳来拉着走？拉到哪里去？在那个年代，手臂上套个红袖章就可以成为“执法者”。整个城市的民警和公安好象突然消失了似的，对于无法无天的事件没有人管，没有人阻止。人群裹着泥尘往西而去，小女孩背往后仰着苦苦挣扎着不肯走，双手紧紧抓着脖子上的绳套，“放了我！放了我！”少女惨烈的叫声一阵阵传来……

我还没有从震惊中回醒过来，突然我的车前似乎有一卧地的物体，我本能地将自行车猛地一拐，原来马路的道牙边躺着一个人！差一点碰上了他。从他花白头发看是个老汉，其背上大块的血茄使衣服与肉体已结成了板状，从僵硬的态度看，他已经死了，且死前受过暴打。我不敢在尸体旁停车，骑过二十米路后问一个卖冰棍的小男孩：“那边路上躺着的老头是死人吗？”“死了两天啦！”小男孩不屑地翻了我一眼。

我骑车往城里赶，见到一个大一些的公交车站上一群红卫兵，他们手上有拿大剪子的，有拿斧子的，身后竖着一块写有大字的木板，上面写着：“尖头皮鞋格啷不论！烫发、长辫格剪不论！”

他们虎视眈眈地审视着每一个上、下车的人。正好有一辆公交车靠站了，下来几个乘客，其中一个年轻妇女，竟光着脚下车来，她一边下车一边举着自己一双凉皮鞋向红卫兵解释：“这是一双很土的凉鞋，没事吧？”红卫兵不耐烦地挥挥手。她才匆忙穿上凉鞋，落荒而逃。

我骑车基本在西城区一带转，那边有不少胡同。骑车至西城区福绥境一带，一座大楼下又发现一具尸体，有人用砖头把他的头给盖上了，只露出下半身。从地上一片血迹看，是上面楼上跳下来死的。西城区昔日安静的胡同里，时有抄家的人群一群群走过，哭声、叫声、彼起此伏。西四一带街上，正在摘老字号商店的招牌，有些老字号的招牌估计上百年都没有人碰过它。

骑车经过西城大玉皇阁一带，一个院里躺着一个老太，从僵硬的态度看，又是一具尸体。我问了边上一位老伯：“这个老太怎么啦？”老伯回答：“死啦，被打死的，是个居委会主任。也没人来拉走，发臭啦！”

我匆匆骑车回校，几个小时的实地考察后我明白，这座建都几百年的古城，正蒙受着明朝建都以来从未经受过的浩劫！校园里所传说的“每天晚上可以收几卡车尸体去火葬场火化”的说法不是在乱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首都到底有多少人被暴力打死或自杀身亡？这已成了只有少数人知道的机密。从我骑车逛街的短短几个小时里就碰上三具尸体来看，这不会是一个小数目。一九六六年，那是一个载入人类罪恶史的血腥年份！

十二、黄报青教授之死

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学生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土建系教师队伍中有三位才子，一位是黄报青，另一位是李道增，还有一位是谁？想不起来了。说他们年富力强，业务上都是实干家。黄报青是土木建筑系民用建筑教研组负责人，五十年代初毕业于清华，是才华横溢的少壮派，系总支委员。黄报青教授与我还有些巧遇。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时，我们一起在北京郊区延庆县花盆公社参加“四清”。黄报青是整个公社的“四清”工作队负责人，这个职务叫“片长”。“四清”时有一段时间，我从S村调到公社，与黄报青教授同住过一个房间，同睡过一张土炕，与黄先生一起生活了好几个月。当时是黄先生，梁思成的研究生袁镔，再加上我，我们三人住一间房。

黄报青先生对工作是相当负责的，生活也极其简朴，效率惊人，口才一流，几件小事印象颇深：一次要赶一个油印文件，第二天开大会必须发下去。那个年代没有复印机，要先刻出蜡纸来再油印。已是晚上八点钟了，尚要连夜刻出六大张蜡纸来。我与袁镔都面面相觑，都不敢接这个任务。素有才子之称的袁镔研究生也说这是来不及的。黄先生袖子一卷说：“我来”！片长亲自动手，我看他刻蜡纸的速度确是惊人！左手捏一支烟，右手如同记笔记，流水行云一般刻蜡纸，一支铁笔发出一片“沙、沙”声。就这样，抽烟不停，刻字不停。不到夜里十一点，他一气呵成，竟刻出六大张蜡纸来！对我讲：“开印吧！”

我看他额头上汗水在发光，一副淡黄色塑料眼镜架在鼻尖上，镜片后闪着聪慧祥和的眼神。另一件事也印象颇深：晚上睡觉了，我们同睡一个炕，我与他两只枕头是挨着的。他外衣脱掉后，里面是一件贴身的衬衣，这衬衣破的也绝了，从衣领处直到最下端边线上有一条直通大口！白乎乎的后背肉全露出来了。我用手摸摸他后背肉说：“黄老师，这衣服穿与不穿有什么区别呀？”

黄先生说：“有区别的，袖子、领子还在嘛！”

的确，白天你看吧，他中山装领子里露出白衬衣的领子，没有这衬衣领子，别人就会认为是穿空壳衣服了。谁会料到这是一件破成什么样的衬衣呀！

一次去下面一个生产队，黄先生叫我去。我看他下炕穿袜穿鞋，他随便抓了两只袜子，一只紫红色的，一只蓝色的，就开始往脚上套。我赶紧制止他，说：“不行！不行！两只袜子颜色完全不一样，人家会笑话的”。

黄先生说：“没事的，穿在鞋里看不见的，暖和就行。搞“四清”嘛，没有那么讲究，不少农民冬天还穿不上袜子呢！”

就这样，他穿着一只红，一只蓝的袜子就出门了。

黄报青先生口才相当好，他烟也抽的够厉害的，只要烟捏上手，便思路泉涌，效率惊人！

有一次要开公社“四清”工作队全体会议，会前一小时，他拆开一包香烟的外壳，在巴掌大的烟壳纸上，密密地写了几个提纲。开会了，台下是上百人的全公社“四清”工作队队员，有清华大学的，有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有北京铁道学院的。黄报青先生作了一个半小时的报告，讲的有条有理，举了不少事例，政策交待的一清二楚，语言生动风趣，台下都在作笔记。谁也发现不了，他的讲稿只是桌面上的这只烟盒壳。年富力强，极具才气的黄报青教授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九六六年会成为他灾难之年！一九六八年初罪恶的“文化大革命”会夺去他宝贵的生命！我也没有想到，一个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竟有如此千军不能夺志的铁骨硬风！黄先生的行径震惊了整个北京教育界。

一九六六年夏，在“四清”一线的全体师生紧急回校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校园里已是贴满了大字报，清华大学党委已被打成“黑党委”，清华的校领导，系领导已被挂牌游街和批斗，说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黄报青先生不接受这个结论，也不接受校、系两级领导被批斗游街的行为。他认为清华大学是全国重点高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清华大学的教育、科研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样的高校被打成是“黑高校”，那么全国的“红”高校是哪一所？说出其名来？他不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全国教育界在走一条“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这个结论性批评。

黄报青先生用实际行动来宣扬自己的政见。土木建筑系总支书记刘小石被批斗游街，本来没有揪黄报青去游街，可是他自觉地站到刘小石等“黑帮”队伍中去一起游街。胡健，刘冰等校领导在被罚扫地，黄报青拿起条帚跟着去“自觉扫地”！他用言论和行动来抗议“文革”风暴，来支持原校系领导，他是清华大学第一位公开站出来反对“文革”运动的教授！第一位公开站出来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整个教育界在走一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论断。

黄报青教授的作为极大地激怒了造反派，也震惊了“文革”当权者。这不是在公开对抗毛主席对教育界的批判吗？不是在公开对抗“文化大革命”吗？

于是铺天盖地大字报贴了出来，称黄报青为“清华大学第一保皇党”。黄受到了血腥的殴打，押其单独一人游街，在游斗中极左派们一次次要压服黄报青，问他：“清华大学党委是不是黑党委？”

黄回答：“从目前公布的材料看，没有可称之为‘黑党委’的证据。”

又问他：“蒋南翔（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黄答：“不是。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他走资本主义道路。”

于是，“打倒清华最顽固保皇派！”口号声四起，极左派们非要打服黄报青不可，就这样，黄报青教授受到了清华大学干部中最残酷的拷打！打的满地乱滚。打毕，问他同样的问题，黄报青宁死不屈！仍是同样回答。

于是皮带乱下，又一阵血腥暴打。这样折磨他好几天，打的已不成人样了。我在学校图书馆外面路上看到过黄报青教授的惨景：赤裸裸光着上身，脊背上和前胸用墨汁打了大叉，脸上背上全是乌青和血痕，腰部有大面积紫红色伤痕，血与短裤结成大块血痂。一群人押着

他在游街，惨不忍睹！血腥的暴打使黄报青教授内脏大出血了！学校把他弄到医院去抢救，一开始医院还不肯救治“黑帮”。

隔了两个月左右，在清华土木建筑系大门口的大字报墙上，贴出了一张黄报青先生的声明大字报，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我已出院了，体罚与拷打不能改变我的观点，我的政治见解和立场与原来一样，没有改变。”

这短短的几句“声明”震惊了清华大学，震惊了上层“文革”发动者们！围观者无数，自从清华大学建校以来，受到这么血腥拷打的教授，黄报青是第一人！如此硬骨浩气，不能移志，不畏强暴的教授，黄报青也是第一人！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受到清华教授不惜洒鲜血抛头颅的反抗！黄先生的表现除了他政见正确之外，更体现了中国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不可夺志”的高贵品质。中华民族有志之士维护自己的信仰与意志是有传统的，几千年前的“诗经”中已有记载：“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其意思是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任人转动。我的心不是草席，不能任人卷折。

“文革”发动了全国亿万学生起来造反，首先矛头直指本地本校的教育领导机构，其核心理由是毛泽东论断中国教育界走的是一条“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

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毕业，其年龄段共占有一个人生命的十七个年头，在册的大学、中学、小学学生总人数和相配备的教师队伍，中国教育系统的师生员工总人数有几亿人之众，如果中国教育系统走的是一条“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试问：领着几亿中国人民去走的一条路线，不是“执政者”领着，谁还能为之？谁还敢为之？中国不是多元化的联邦制国体，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让几亿中国人民去走一条方向完全错误的“资产阶级的道路”，请问共和国的当政者，你们是在其位不谋其政了吗？是放弃领导不尽其职了吗？所以对中国教育界教育路线的全盘否定的提法不仅打击了大多数，也否定了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也否定了当政者自己。

一九六七年“五一”劳动节，我在清华大学照澜院路上，碰到了黄报青教授，他穿着一件笔挺的米黄色中山装，带着他的女儿，一个十一、二岁的美丽文静的小姑娘。黄先生缓步慢行，可能内伤仍在。但他挺胸直视，气度不凡。我看先生重伤后仍是英气不减，真是敬佩不已。先生看见了我，昔日同炕而睡的学生，向我慈爱友好地微笑，我们互相轻轻的点头示意，我赶紧向他悄悄说了一句：“先生要保重”。

说毕我就匆匆离开了，我知道，先生周围会有便衣。谁知，这一别竟会是与先生的永别！

进一步的迫害在逼近先生，据传，黄报青先生被认为“精神有病”而送去某处“治疗”。老百姓一听说“精神有病”，就会汗毛倒竖！因为在极左的“四人帮”年代，把好人打成“精神病人”是常用的政治迫害手法。

果然，黄报青先生“治疗”回来后，天天头痛欲裂，不能入眠，只能喝大量的白酒才能入睡一会儿。几个月的折磨，终于痛不欲生，在一九六八年初一个冬日，黄报青先生跳楼自尽了。从表面行为看称之为“自尽”，实质是政治迫害头痛欲裂致死。清华大学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教授，人民共和国失去了一位浩气如虹的伟人，母亲祖国失去了一位忠诚的儿子！

清华大学的“水木清华”小山上有一座“闻亭”，那是为了纪念倒在国民党枪口下的闻一多教授的。依此类比，被打成血肉模糊的黄报青教授的事迹，清华大学应命名一座“报青大楼”来纪念先生才慰众望！时下大学内建筑物多以捐款者命名，多了财气，少了精神。我期盼着，在我有生之年，我可以将一束鲜花放在清华大学“报青大楼”的门厅前，我可以将头重重地叩在“报青大楼”的台阶上，向先生的亡灵致以泣泪的问候！

□ 原载傅培程著《云卷云舒——清华笔记》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